

目 录

纪念邓演达烈士.....周素玉口述 于载毅整理	1
追念邓演达老师.....彭秋萍(锋)	4
孙中山的忠实卫士马湘.....钟纬贤	13
忆陈少白先生.....陈沧海	17
回忆叶桂棠医师.....潘赞英	26
广东蒙学教育陈子援传略.....龙半士	31
林森视察崖门.....伦海滨	34
江门商团始末记.....许 只	36
粤中区抗日战争时期军政机关的交替经过.....彭十郎	52
解放初期的工运工作.....晚 虹	61
抗战前后江门青年活动概况.....林振炽 黄培年	65
江门地区风俗岁时记.....陈一峰	72
阳春基督教概况.....梁廷坤	80
“亦国”小史.....陈 湛	83
今昔潮连八景.....陈昭权	85
编修《新会县志》义略.....伦海滨	90
恩平县大办文史开创文史工作的新局面.....恩平县政协	97

纪念邓演达烈士

——回忆我幼年时代深受教养大恩的四舅父

周素玉（原名丽贤）口述

于载毅 整理

一九八五年三月一日，是我四舅邓演达诞辰九十周年。他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献身于革命事业，当北伐胜利之际，蒋介石背叛了革命，实行独裁专制，国民革命的形势、趋向低潮。邓演达（以下统称四舅）旋即转入艰苦的地下革命工作。他置个人安危于不顾，为公忘私，绝不屈服于反动派的威胁利诱，最后献出了宝贵的生命，惨遭蒋帮秘密杀害于南京，享年仅三十六岁。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，战斗的一生，为国家为人民，高风亮节，彪炳千秋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人民政府将四舅的遗骸迁葬于中山陵左侧，以表忠烈。胡耀邦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，公认他是“一贯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党外亲密战友”，这是党给予我四舅父的莫大荣誉。他的伟大形象，将永垂不朽。

我是他的外甥女儿，自幼由四舅父抚养长大成人。近几年在有关刊物上，看到了很多革命前辈撰写的纪念演达烈士的革命史绩，颇为详尽；但对他青少年时代的记录，尚无记载。现将我幼年时代的亲历，作一些片断追忆，以作补遗。因年事已久，难免挂一漏万，尚希四舅的生前友好，赐予指正。

四舅的家庭概况：一八九五年三月一日，四舅出生于广东省惠阳县永湖乡鹿颈村一个贫穷的家庭里。我外祖父讳镜仁，是清末秀才，一度曾在海南岛及惠州城任教。外祖母叶氏，生有两男两女，大舅父演存，字竞生，（原名邓昌明），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及北京陆军大学，曾任第四军参谋长，汉阳兵工厂厂长，广东石井兵工厂厂长等职。大妗母何氏，（名已忘记）。我母排行第二，名邓立瑾，还有一个姨母排行第三，名邓立燕，演达排行第四（故我惯称他为四舅），字择生（原名邓达明）。四妗母郑立真，惠阳淡水人，结婚后无生育。大舅四舅军校毕业后，因便于工作，即迁离故乡。大舅初居北京，后居广州。四舅迁居于广州东山瓦窑后街，与陈铭枢先生比邻。他俩因属同僚，时相过从。四舅居此数年，直至北伐率军北上时才离开广州。

外祖母曾讲过舅父兄弟报考军校的一段往事：当时四舅父年方十四岁，即立志投考军校，许身祖国。当时外祖父是不赞同的，主因是反对他兄弟同考军校。一天他们乘家人不备，双双搭上了由东江开往广州的货船，匿在仓内，后被外祖父发觉，急忙赶到码头以图制止，奈船已启行，只好望船兴叹。可见四舅童年时代，已抱有远大理想，纵使家庭反对，也阻挠不得他的决心。

四舅父聪敏好学，当驻军广州北郊场时，稍暇回家，他还是手不释卷，博览群书的。他反对封建思想，不遗余力。当我幼年丧父，我母守寡时，四舅认为这是吃人的旧礼教对妇女不平等的虐待，应予废除。他曾多次劝我母亲改嫁。

四舅生前是钟爱我的。当他迁广州时，即想携我同往，

但外祖父却认为我非邓家儿女，不肯让我跟着去，说什么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等等。四舅则认为“家姐之女就是邓家骨肉，无父孤儿，应义不容辞地培养她成长”。他力排众议，将我接到他的身边，让我在广州读小学、中学。小学期间，他偶然得暇，即教我读书认字，并亲自握着我的手教我写字。时隔六十多年，此种亲情犹历历如昨，我每一念及，都不禁潸然泪下。四舅对我的关怀抚育，使我终生未能忘怀。

犹有一事，外祖母系一个乡间妇女，治理家事，锱铢计较，四舅父常对她说“将来的新社会，一定能：幼有所教，老有所养，耕者有其田，你可以不必省吃俭用，为后代儿孙操心。”从以上述谈吐中，充分证明他对拥护中山先生所倡导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，走向世界大同的目标是坚定不移的。

四舅父治军虽严，但从不藉军营私，时刻不忘爱护袍泽，在北伐前的军阀时代，这种点滴奉公的行为是很突出的。当他担任粤军第一师步兵第三团团长时期，即由他发起组织一个“断金学会”，将公家节余积蓄起来，倘团内官佐不幸阵亡牺牲者，即提出部分储金，作为身后抚恤，他的部下邓××阵亡后即得受此款周济，死者之弟并被送就读于岭南大学，直至毕业能够独立为止。

追念邓演达老师

——为黄埔军校建校六十周年纪念日而作

彭秋平（锋）

邓演达先生（1895—1931）字择生，广东惠阳县永湖乡鹿岗村人（旧称鹿颈），先后毕业于陆军保定军官学校和德国陆军大学，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追随者，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。他一生忠于革命，竭诚拥护孙中山先生的“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”三大政策，并为之实现，致力不懈。从一九二四年一月第一次国共合作起，到一九二七年上半年止，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蓬勃发展的几年，也是邓先生对中国作出重要贡献的几年。他为祖国的统一、独立、自由，为实现国共合作的三大政策，披肝沥胆，鞠躬尽瘁，立下彪炳功勋。中国共产党把他誉为好朋友。余年十五，初认识邓先生于兵荒马乱之中，在他的提携教诲下，经历了大革命前后的一段难忘的岁月；假如说孙中山是开导我思想革命第一步的慈父，那么，邓先生则是带领我走向革命实践道路的严师。日月如逝，于今垂垂六十余年矣。缅怀先烈，萦怀胸臆，爰将记忆所及，纪述片断，藉资纪念。

从“广东新学生社”说起

一九二三年六月，广东新学生社成立，它是中国社会主

义青年团(今共青团)的外围组织,总社执行委员会书记是国委阮啸仙兼任,拥有社员七八千之众。发展至粤、桂、闽各省县,成为青年运动最初的一股强大力量。社员分布各大、中、专学校,普遍设立社支部。当时我是广州石室教会学校圣心书院(今市立三中)社支部负责人之一。在当时的反英、反日、抵制劣货、收回“关余”、及反基督、天主教,反文化侵略,收回教育权等罢课、示威斗争中,皆曾参与前列。那时邓演达先生是拱卫大元帅府的粤军第三团的团长,他积极支持学生的爱国正义行动。我通过他得到孙大元帅和孙夫人宋庆龄女士的几次接见。他还亲自向广东警察厅长魏邦平交涉释放被逮捕学生,与抚恤被镇压死伤学生家属事宜。在他的帮助与鼓舞下,学生意气昂扬,许多原来得不到解决,甚或无人敢过问的问题,特别是镇压与反镇压的问题,都得到满意的解决。从这个时候起,我初步了解邓先生的为人,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感,和对革命后代无微不至的爱护与关怀:他既是个具有高尚品德和优良风格的国民党左派代表人物,也是个对共产党人非常关心,真正同情的战友。他朴素、真挚、给人以温暖感,其情操绝俗,严而有信,威而不猛,凡与之接触过的人,都会留下这样的印象,铭刻于心,永难泯灭。

第一次并肩作战

随着国民党一大改组后,中国革命形势高涨,而帝国主义者,却加紧对中国革命的干涉与破坏,一面勾结直系军阀和陈炯明叛军,一面运动广州商团,妄想从我内部颠覆广

东革命政府。商团是一支代表帝国主义和国内豪绅、地主、买办阶级，及各种反动势力大联盟的反动武装。全市约有十个团包括各县镇逾万之众。首领是陈廉伯、陈恭受(注一)，他以“扣械”(注二)为借口，阴谋武装叛乱。提出“驱逐孙文”、“建立商人政府”等反动口号，并强迫广州、佛山、九江、顺德各市镇商人罢市。英帝则集结兵舰于白鹅潭助威，沙面英总领事向我政府发出最后通牒相要挟。在此关键时刻，共产党人和以廖仲凯为首的国民党左派，革命军人和广大工农群众，排除革命阵营内右派势力，如胡汉民、戴季陶，邓泽如，及滇系军阀范石生、廖行超等的阻挠与压力。坚决主张厉行镇压商团叛乱，下令通缉陈廉伯、陈恭受。当时邓演达先生在黄埔军校(注三)积极支持、表示愿率领军校学生军枕戈以待，誓为政府后盾。

一九二四年十月十日国庆节，广州市革命工农、学生各界群众三万余人在第一公园(今起义路中央公园)举行“国难警告节”大会，周恩来同志在会上提出：“国民党、共产党与工、农、兵、学联合起来，解除商团反革命武装，建立工、农、兵、学革命大同盟，实行民主革命”的号召。会后举行大示威巡行。商团则在其西关根据地区建街闸，筑堡垒，岗哨林立，伺机发动武装叛乱，枪杀巡行群众，截击游行队伍。孙中山先生在韶关闻讯，令北伐军回师靖乱。

十月十五日，孙中山先生即令黄埔军校学生军会同驻粤各军分路包围西关地区，当时邓先生亲率的学生军一部，则由我所率的各校学生军小队作响导前进(注四)，由十三行、打铜街、十八甫，直追华贵路。在邓先生灵活的指挥下，有

如西风之扫落叶。上西关地区带河路，龙津路，长寿路一带的商团军总领队钟叔本与我有通家之谊，在我的策动下，乃率领商团军三百多人向邓先生献械投诚，并将商团军征集来的装备，库藏粮械悉数缴交。其他各路军如滇军，李福林粤军则消极行动，进展缓慢；但在革命的工农军、学生军和广大革命群众支援下，经过数小时巷战，各路商团军纷纷溃散瓦解。

事件平息后，邓先生爽朗而又严肃地用手掌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好细佬！”“好细佬！”“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”。随后他在衣袋上取下他的金墨水笔送我留作纪念，嘱我“好好学习！”旋即挥军而去。我凝视着他那飒爽英姿，骁勇矫健的身影，深受鼓舞，不忍遽去。

“6.19 黄埔精神”永存

一九二六年春，圣心书院反基督教运动罢课后，我转学在远东英法文学院就读。一天，邓演达先生和一个青年军官突然出现在我住的陈家祠老家门口，一见如故。原来当时陈家祠（在我家屋后）、黄家祠（在我家左侧）的驻军是黄埔军校的第四期入伍生，邓先生是来检阅部队的，同行那位青年军官是张治中，驻军的总队长。我母亲招呼他俩入屋坐。商谈之下，才知道邓先生镇压商团一役之后，曾去欧洲游历，现任黄埔军校教育长。邓先生向我问长问短，问我今年多大岁数，我说刚满十八岁。他便转向我母亲征求意见，嘱我马上去报名投考军校，旋即离去。后来我报考的是第五期入伍生，考前我因病，检验体格不合格，没被录取。邓先生闻讯，

又亲自打电话给入伍生部长方鼎英先生，代我改名彭锋报考第六期入伍生（我原名彭鹤峰，当时军校四、五、六期生，都是紧接着招生的（四期未毕业，五期即入伍，同时又招六期生）。六期入伍生发榜我被录取被编入入伍生第一团（团长郭大荣）第一营（营长沈振亚）。初时全团驻沙河集训。不幸在“三、一二中山舰事件”，我与邓先生一度失去联络，直至同年七月间北伐军北上前夕，方知道邓先生调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。我乃约同在校几位同学在荔枝湾游艇上与之饯行，兴尽而别。邓先生被害后，我重游荔枝湾时，曾赋诗一律以寄怀：

花开花落语叮叮，尚忆销魂共饯行；
荔水孤舫双桨雨，柳波千树一声莺。
重来景物都陈迹，几见江山永太平！
一笑梦中新旧事，多情结局应无情。

（“孤舫”荔湾游艇俗称）

当邓先生随北伐军乘粤汉铁路火车北上时，恰巧入伍生部又派我所在的第一营代表前往欢送，在广州黄沙车站，我和他不期而遇，又幸见邓先生一面，瀕行，他紧握我的双手，只叮嘱一句话：“干革命要时刻警惕敌人呀”！

一九二七年“四、一二”蒋介石背叛革命，在军校大肆逮捕学生时，我入伍生第一团适驻戍石龙镇，行动较自由，我才得与同班同学方奋德（惠阳人）乘夜离队出走回穗。同年五月我们响应邓先生的号召：“集中到武汉去！”当时邓先生是武

汉黄埔分校代校长，兼北伐军总部武汉行营主任。我们到达武昌南湖军校后，邓先生正忙于进行第二次北伐讨奉，进军河南，没有在校，但于戎马倥偬中，他仍二次约我去汉口黄坡路公馆坐谈，一如往昔，坦率谈心，谈形势，谈农民问题，谈感想，滔滔不绝，循循善诱，披肝见诚；但不苟言笑，大而至大是大非，小而到生活小节问题上，都坚持原则，态度严肃，处事果断，不马虎迁就。他见我六月暑天，怕热不打绑腿、不扣风纪钮，就告诫我：“如果在学校，我就要罚你禁闭”。邓先生军纪严明，于此可见一斑。他说话虽简短，但中心明确，启发性大。我至今尚记得，一次他对我讲“女娲氏炼石补天”故事。这个故事是一个创造世界的寓言，它鼓舞着人类为自由幸福而勤劳奋斗，在今天还不失其现实的意义，发人深思。可是自此以后，再没有见到邓先生了，传说他已出走。

“七、一五事变”，汪蒋合流，军校结束，学生被改编为第四军军官教导团，由团长叶剑英（第四军参谋长兼）率领回广州。发动了有名的十二月十一日广州公社起义，起义虽失败了，黄埔精神不死。

“仰天大笑出门去

我辈岂是蓬蒿人”（注五）

一九三〇年五月，我知道邓先生从欧洲返抵上海，乃由日本回沪见他。久别重晤，恍如隔世，言谈间，邓先生问我：“谁保送你入军校的？”我答是张学良。他沉思一会说：“那好，留东的中国军事学生派系分布情形，就是中国

军阀割据局面和帝国主义势力范围的缩影，其中有张学良的东北系，冯玉祥的西北系，和山西系的阎锡山，西南系的陈济棠、四川系的卢汉，中央系的蒋介石。这样分崩离析，是中国统一的大患，怎样使之成为我所用？你试想想！”我思索后说：邓先生过去不是反复教导我说过孙子那句话吗？“以迂为直，以患为利，是也”。邓先生听后慨然曰：“那你回日本就相机行事吧，要有步骤，有重点，把各系学生联系上，一个个将他的地址记起来”。他随即在地图上指示给我看，“重点就是两个，西北系冯玉祥和西南系陈济棠”。（注六）最后他又说：“蒋介石叫嚣攘外必先安内”，我们就要针锋相对，“抗日必先反蒋”，我聆听之后，觉得邓先生这一番话是别开生面的、深刻而有启发性的话，过去我是没有听见过的。我坚决表示不负所期。接着我又问他第三党的事（即中国国民党行动委员会，今农工民主党前身），他断然挥手说：“你不必过问”！

临别邓先生对我念了两句古诗：“仰天大笑出门去，我辈岂是蓬蒿人”！作为临别赠言。岂知此别竟成诀别！一九三二年我由日本归国抗日，重过邓先生上海故居，时邓先生已被害，古鼎华将军曾出示题为秋柳的悼亡诗一律，读后感而依韵奉和，藉表致哀：

记得柔条拂画墙，春风曾折上河梁，
难逢青眼怜歧路，偏馆愁心到异乡（记武汉出走事）。
忍看菊疏惊短鬓，那堪憔悴老秋霜。
天涯岂是蓬蒿客，大笑出门枉断肠（指沪上重唔事）。

邓先生伟大的一生，是革命战斗的一生，是忠实追随孙中山先生的一生。他的韬略雄才，为国为民、为革命事业，作出杰出的贡献，是无庸置疑的。但邓先生毕竟是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，由于历史条件的制约，思想上有着一定的局限性。他不同意中国共产党的纲领；但他拥护三大政策，与共产党合作是坚决的，以三大政策作为加速三民主义实施的行动纲领，在大革命年代，的确曾起过积极的作用。邓先生当时曾对我说过：“三大政策之于三民主义，相当于“兀”、“儿”的关系”这句话（注七），孙中山先生亦曾有言：“共产是民生主义的理想，民生是共产主义的实行”、“我们对于共产主义，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，并且是个好朋友”。由此可见，邓先生“兀”、“儿”之喻，是正确的。（儿几车旁）

“儿”的关系”这句话（注七），孙中山先生亦曾有言：“共产是民生主义的理想，民生是共产主义的实行”、“我们对于共产主义，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，并且是个好朋友”。由此可见，邓先生“兀”、“儿”之喻，是正确的。（儿几车旁）

今天，我们在此纪念黄埔军校建校六十周年纪念的时候，我们要发扬6.16黄埔精神！我们要学习邓演达先生热爱祖国，热爱人民的崇高品德，要学习他那刚正不阿，从善如流，嫉恶如仇”，爱憎分明的革命精神！要学习他与中国共产党合作，成为中国共产党亲密战友的实际行动，为祖国的统一大业，为振兴中华而奋斗。邓演达先生永垂不朽！

附注：一、陈廉伯是英国汇丰银行买办、广州分行买办，陈恭受是佛山地区大恶霸豪绅。

二、“扣械”：陈廉伯为了阴谋叛乱，擅自向香港南利洋行订购枪械，计长短枪九千八百四十一支，子弹三百三十七万四千二百发，由外国商船挪威“哈佛号”私运广州。

1924年8月被广州革命政府查获扣留充公。

三、邓演达先生当时是黄埔军校训练部付主任（正由李济深挂名）兼学生总队长。

四、当时我是广州中学学生军小队长，因我世居广州上西关，生于斯，长于斯，对西关区的横街曲巷，了如指掌。

五、“仰天大笑出门去，我辈岂是蓬蒿人”诗句出自李太白的“南陵别儿童入京”古诗，意思是临出门时仰天大笑，我怎能是只作个草野之夫，默默无闻了此一生呢？

六、一九三二年陈济棠在广东建立西南政府反蒋，一九三三年冯玉祥在张恒成立西北抗日同盟军讨蒋抗日，余参与吉鸿昌将军部当独立师长。

七、“兀”，“儿”语出论语为政编：“大车无兀，小车无儿，其何以行之哉”句，比喻辅车相依，缺一不可之意。

孙中山的忠实卫士——马湘

钟伟贤

人们在纪念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、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孙中山先生时，总忘不了孙中山的忠实卫士、美州华侨马湘。

马湘，小名天湘，又名吉堂，号修铤。一八八九年生于台山县白沙区山朗乡敦和村，是加拿大温哥华洪门主持之一的马厚庶之子。少年在乡耕田、看牛。十五岁时，与兄天来、弟天华远渡海外谋生，先到墨西哥，再到加拿大，后来在美国马索当农场工人，好习武而有侠风。

一九〇九年，孙中山先生到巴索地区进行革命宣传活动，在当地致公堂举行了三个多小时的演说，控诉清庭腐败无能，列强瓜分中国的罪行，号召全体同胞起来革命，推翻清朝统治，挽救危难的中华。马湘听了热血沸腾，流下了激动的热泪。在晚宴中，他跑到孙中山先生跟前跪下，恳切地要求参加革命。孙先生对他说：“跟我革命？革命是会杀头的，你有这个胆量吗？”马湘坚决地说：“杀头？杀就杀，我不怕。我们同胞兄弟三个，杀了我，还有两个兄弟侍奉父母；我又未娶妻，没有牵累，怕什么？”孙先生听了很满意，就答允了他的请求。于是，马湘就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，从事革命活动。在孙中山离开美国前往加拿大活动时，马湘还写了一封信给孙中山先生带去见他在温哥华经商的父亲，请求助孙中山先生一臂之力。

一九一五年冬，袁世凯复辟帝制。孙中山先生发起讨袁运动，号召华侨回国讨伐袁世凯。马湘当时已在加拿大，为避免父亲阻拦，化名黄升与同乡黄惠龙（黄湘）一起参加了以加拿大洪门为骨干的“华侨讨袁先锋队”。集合在日本横滨训练了五个月，后开回山东潍县周村。在一个秋雨之夜，马湘和队员们攻入昌乐城，俘虏了一个营的敌人。在准备进攻山东省会济南时，袁世凯病死，讨袁军罢，先锋队奉孙中山调令开往上海集中。在慰劳会上，孙中山认出了马湘，便留作卫士。从此，马湘就一直紧随孙中山，后升任卫士队长和副官等职务，达十多年之久。他遇事细心谨慎，机智勇敢，忠心耿耿，侍卫至孙中山逝世为止。

一九一七年，北洋军阀段祺瑞破坏约法，孙中山南下广州成立护法政府，设大元帅府于河南。当时，桂系军阀莫荣新任广东督军，开烟开赌，滥收捐税，鱼肉人民。孙中山有意剪除之，莫荣新也以高官厚禄引诱担任大元帅府卫兵连长的胡新谋刺孙中山。一天夜晚，马湘发现胡新行迹可疑，即制止其上楼，并报告孙中山，献计搜查胡新住宅，获得行刺的确凿罪证，当即将胡新扣留枪毙。

一九二二年，陈炯明叛乱，围攻越秀山总统府。马湘和黄惠龙掩护孙中山撤离总统府后，继续与孙夫人宋庆龄坚守越秀楼，处理文件等善后工作。当时敌人的进攻很猛烈，马湘身先士卒，亲自抱起机关枪英勇反击敌人。叛军的指挥气急败坏地狂叫要以一千元买他的头。由于敌众我寡，叛军攻进总统府，放火焚烧越秀楼。马湘才和黄惠龙一起，保护宋庆龄怀抱大总统印撤退。途中，遇到叛军截击，马湘情急生

智，把身上的银币撒向叛军，趁叛军争夺之际，乘乱通过。至敌人的岗哨前，马湘递上一篮菜说：“兄弟，请加菜”！遂与宋庆龄等顺利通过。最后，几经周折，才把宋庆龄送到长洲要塞司令部与孙中山团聚，受到孙中山先生的嘉奖。所以，当时有“黄湘马湘，相得益彰”之誉。

为清除革命中心广州的后患，孙大元帅三次督军东征盘踞在惠州的陈炯明，马湘一步不离地跟随孙中山左右，忠于职守，保护了孙中山的安全，荣升为少将副官。

马湘不仅在硝烟 漫的战场上表现勇敢坚强，而且在生活细节中也体现了他对孙中山先生的忠勤。有一次，宋庆龄看到身为副官的他还自己浆洗衣服，对他说：“有人说你被人以二万元收买刺杀总统，并且已将钱在香港买了洋楼。起初我就不相信有这等事。现在看到你的表现，我对你就更信任了。”马湘当即表示：“莫说二万元，就算多到算不尽，我也不会被人收买的，请夫人放心。”在孙中山病笃之时，马湘更是不离左右，侍奉汤药。孙中山因久卧病床，双足麻痹，不能安眠，马湘就跪在床前，把孙中山的双足放在肩上，慢慢按摩，让孙中山安然入睡。所以，孙中山在临终前，嘱咐宋庆龄说：“马湘一生跟随我，必须养他过世，教育他的子女到大学毕业。”孙中山逝世后，马湘不图名利，但仍担任陵园拱卫处长，默默无闻地守卫在中山陵。后不满蒋介石的独裁统治，隐居于香港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宋庆龄致电马湘，邀请他回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，欢度晚年。他欣然应允而回广州定居，任省政协委员。

马湘晚年还念念不忘在台湾的旧友，期望他们能以大局为重，携手振兴中华，实现总理遗训，完成祖国一统大业。一九七三年他在香港病逝。

马湘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卫士，他一生对革命事业，作出了杰出的贡献，光照史册。